

语言和人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上海教育出版社

社会学 应用语言 若干探索

YINGYONG
SHEHUI
YUYANXUE
RUOGAN
TANSUO

陈原

YUYAN
HE
REN



语 言 和 人

应用社会语言学若干探索

陈 原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沪)新登字 107 号

语 言 和 人

应用社会语言学若干探索

陈 原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太仓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68,000

1994 年 2 月第 1 版 199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 本

ISBN 7-5320-3159-4/G·3087 定价: 5.10 元

序

语言和人——这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大题目，很多学科的学者，都有兴趣去研究它的内涵。七十年代中期，西方一位学人就把“语言和人”这个课题界定为“人间的交际”(human communication)^①，包括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verbal and nonverbal)，这里所谓“交际”，就是维纳(Norbert Wiener)控制论所指的“通讯”^②。不能设想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际”或“通讯”)可以离开语言，即使人与机器(电子计算机)之间的沟通(“交际”或“通讯”)——按照现今科学发展的水平来论断——也不能离开语言(自然语言或计算机语言)；同时，也不能设想语言能脱离人间而存在，因为——按照现今科学发展的水平论断——还没有在人以外的生物圈中发现语言，这里所谓“语言”是现今人们共同认识的那种有声和表意的符号系列。正因为这样，甚至可以说，语言和人是一种共生现象；语言和人共生，比之人机共生现象似乎更能被人接受。

这部题名为《语言和人》的论文集，是作者对语言和人这样诱人的大题目所作的小范围探索，即本书副标题所揭示的：对应用社会语言学的若干新探索。这是一部论文集，但又不是通常意义的论文集，因为收在本书中的论文都经过程度不同的剪裁和加工，标明了章节，集合而成一个探讨语言和人某些层面的松散体系。各章节都是根据我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这几年间所作的演讲或研究论文写成的，只有第11章完成得较早，体裁也较特别，那是我八十年代中期研究控制论语言学时下写的十多篇科学论文中的一篇。各章节的文本(text)虽经增删修订，但仍尽可能保留了原来的遣词、文体和说话气氛，因为我想只有如此，才能表达出作

者在特定场合下传递(交流)的信息和感情。

从第1章到第13章,探索了应用社会语言学中的若干语言现象或范畴,其中不乏前人已经探索过,我在这里可以说只作了某些新的补充;也有前人未曾探索过的,例如第5章关于“论语言马赛克现象”,是我在一个特定语境中长期观察的结果——它不同于双语现象(bilingualism),多语现象(multilingualism),也不同于“泾浜语”(pidgin)或“混合语(克里奥尔)”(creole);又如第10章关于“驾驭”文字的艺术,则是从语言文字交际功能出发,探讨文字编辑的某些“艺术”的,尽管前人对编辑工作者的语文修养做过卓有成效的论述,但这里所说则是前人不多阐述的一些论点。只有最后两章是一种概括性的尝试——第14章是应一个国际社会学刊物写的,为满足主编的提示和要求,做了发展状况的概括和专家的提名。提名是举例性质的,很难全面,只能请我尊敬的同道们谅解了;在分析现状时,我强调这门学科在当代中国是同现实的社会生活密切结合而发展的,亦即我在文中说的实践性。我以为这个倾向是突出的,而且是可取的,因而社会语言学在中国从头就带着理论联系实际的意义,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带应用社会语言学的倾向。

最后一章(第15章)是作者的自我反省。不容讳言,作者从最初研究语言现象开始,一直到今日,都力图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作为方法论的基本点,我至今仍这样认为;作者确信即使微不足道的成果也是从这样的科学方法论出发才能取得的。

这部书是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从事语言信息学的研究(1990—1991)的同时编成初稿的,其中有三章的主要内容也是那时初次写定的。大学图书馆和研究所的设备,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工作条件。我特别要向陈方正所长和当时在所里工作的张双庆先生和林道群先生表示深深的谢意。如果没有上海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和新老编辑同志的关注,这部书也很难同读者见面,为

此,我也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陈 原

1992年2月

注:

① 麦哥马克(W.C. McCormack)与沃姆(S.A. Wurm)主编的《语言和人》(Language and Man, 海牙, 1976)。引语见麦氏《序论》(Introduction)页3。

② 维纳的《控制论》一书副标题为On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 其中Communication一字中译作“通讯”。

目 录

序

1 论变异	1
1.1 变异——一种社会语言现象	1
1.2 语言“化石”	2
1.3 语言变异	5
1.4 语汇变异	9
1.5 字形变异	10
1.6 汉字的字量	16
1.7 变异图表	20
2 论变异与规范	22
2.1 混乱·规范·变异	22
2.2 应用社会语言学	24
2.3 从无序到有序	26
2.4 约定俗成	27
2.5 两个领域	28
2.6 新语词	30
3 论借词	34
3.1 借词现象与文化接触	34
3.2 严复造字	35
3.3 任何语言都不能“自给自足”	37
3.4 泾浜、克里奥尔、马赛克现象	39
3.5 西方人与文明古国	40

3.6	文化和语言相互接触的轨迹	42
3.7	消极和积极因素	45
3.8	高名凯和岑麒祥	46
3.9	《汉语外来语词典》的出版	47
4	论语言接触	55
4.1	语言与文化	55
4.2	民族信心与异文化	56
4.3	“塔”	57
4.4	输出和输入	60
5	论语言“马赛克”现象	63
5.1	香港的语言环境	63
5.2	语言“马赛克”	64
5.3	“马赛克”现象与新语词	66
6	论术语	68
6.1	术语和术语学	68
6.2	电工革命和列宁的公式	70
6.3	现代意义的术语学	71
6.4	电工革命和信息革命	72
6.5	第三世界的迫切任务	73
6.6	应用社会语言学者的举例	74
6.7	术语的国际化问题	76
6.8	术语学在中国	76
7	论汉字	80
7.1	“化石”和“轨迹”	80
7.2	“汉字文化圈”	81
7.3	马、牛、羊	82
7.4	有关“牛”的种种概念的代码	83
7.5	文化浪潮“沉积”一层借词	89

7.6	科技新造字	92
7.7	非正规(非规范)汉字	93
7.8	汉字书写系统的简化过程	96
7.9	权威的汉字库	97
7.10	论《汉语大字典》出版的意义	99
8	论语言工程	106
8.1	语言工程	106
8.2	几个术语的界定	108
8.3	定量分析	109
8.4	从定量到定性	110
8.5	选取语料的最优量	112
8.6	《现代汉语频率词典》	113
8.7	先后两次现代汉语字频测定	114
8.8	现代汉语词频测定	117
8.9	新闻用汉字频率测定	119
8.10	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和通用字表的制定	119
8.11	测定汉字部件的语言工程	121
8.12	测定姓氏、姓名用字的语言工程	122
9	论自然语言处理	126
9.1	语言科学与信息科学的结合	126
9.2	人机对话(自然语言理解)	126
9.3	人工智能和语言歧义性	128
10	论“驾驭”文字的艺术	130
10.1	所有文本里都有个恶魔	130
10.2	时刻要记住规范化	132
10.3	要会“驾驭”字词	136
10.4	记忆往往骗人	139
10.5	不要强加于人	142

10.6	学会作文字宣传	145
10.7	练笔是一种有益的文字实践	146
11	论信息量	149
11.1	信息量公式	149
11.2	最大信息量	150
11.3	推论	152
12	论对话	154
12.1	双向信息流	154
12.2	信息反馈	154
12.3	对话与社会生活	156
12.4	人机对话	158
13	论名言/警句	161
13.1	编引语词典	161
13.2	浓缩了的信息	162
13.3	引语词典的作用	163
14	论社会语言学在中国	165
14.1	社会语境的巨大变化	165
14.2	历史的传统	168
14.3	实践性的特点	169
14.4	近十年的成就	170
15	对社会语言学若干范畴的再认识	174
15.1	引论	174
15.2	辩证法	175
15.3	经典作家与语言学	176
15.4	《资本论》的启发	178
15.5	《语言学与经济学》	179
15.6	语言与阶级	182
15.7	语言拜物教	184

15.8 语言污染.....	188
15.9 科学术语.....	190
15.10 语言与思维.....	193
15.11 语言与文化.....	195
书目举要.....	201
外国人名汉译对照表.....	213

论 变 异

1.1 变异——一种社会语言现象

变异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语言现象。凡是活的语言，应当说，无时无刻不在变异中。正因为这样，社会语言学——不论哪一学派的社会语言学——才着重研究语言的变异。

前几年我在给研究生作社会语言学的启发报告时，把变异列为第一课^①。我那时说过：“在人类社会交际中，语言文字是经常变动的，无论书面语还是口语，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主要的原因是使用语言的这个社会在变动着。可以说，没有变异就没有语言的发展，也就没有社会语言学。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语言学的中心问题就是变异。”我现在还是这样看。

我认为社会语言学研究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一个变量是社会，另一个变量是语言。从语言的变化可以窥见社会的变化，这是容易知道的；从社会的变动所引起的语言变异，其实也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语言文字变异会不会或能不能给人类社会或思维方式带来若干影响，引起若干变化，这个问题还要深入研究。我的《社会语言学》^②在第十章和第十一章的标题就表达了我上面的观点，那就是，“从社会生活观察语言变化”，“从语言变化探索社会生活的奥秘。”我说的是变化，而不是变异。变异在这里指的是变化的结果。

语言的变异包括很多方面，例如语音的，语义的，语法的，语形(字形)的等等，我曾经表达过要着重关注的是语汇和语义的变异。我在一本书的前记^③中说过：“不少外国社会语言学家是着重研究语音与社会因素的相互影响，我〔这本小书〕则着重在语汇(语义)的研究”，因为在所有变化中，语汇(语义)的变化是最广泛和最迅速的。

关于变异的理论分析，很容易在各种社会语言学的教科书和专门著作中找到；但对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所发生的语言变化作具体的研究分析，则是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观察、记录、分析与综合才能略见成效。我1990—1991年在香港做研究工作时，作过一次学术演讲，可以说是这样的一种探索。下面就是演讲的全文记录稿^④。(§1.2—§1.6)

1.2 语言“化石”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我今天打算讲一小时多一点。这个会堂很大，恐怕难以提问和讨论。我五十二年前离开广州，四十二年前曾到香港住了五个月。从那时以后，除了最近在香港中文大学用广州话演讲过一次之外，就没有机会讲广州话。可以说我不讲广州话已经半个世纪了。刚才主席先生说，我讲的广州话是变异了的广州话，一点不错——或者说是从普通话“翻译”过来的广州话。不过我今天仍然尝试用广州话来演讲，我努力讲得像个样，听不懂请大家提出来，因为我讲的广州话，已经是广州话“化石”——既不是现在的广州话，更不是香港人讲的广州话。我讲的广州话可以说是一种“语言化石”，那是五十多年前广州人讲的广州话，同现在广州人讲的广州话有很大的分别，同现在香港人讲的广州话差别更大。在我上面提到的这段期间，虽则只有半个世纪，语言发生了历时和共时的

变异。所谓历时的变异，是五十多年引起的变化；所谓共时的变异，就是地域不同（比方说广州话到了香港）引起的变化。另外，说话的人所处的地位不同，阶层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生活习惯不同，都可以使他说的同一种语言发生变异^⑤。

语言化石。我不知道哪一位学者使用过这个术语。我用这个术语是一种象征的意义。化石指的是经过自然力（стихия）的作用，古生物的遗体、遗物及其某些生活现象，保存在地层中的石化了的“轨迹”。引申到语言方面，即已经变化了的语言的原形，保存（蕴藏）在某些社会群体或个体中的现象。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既然是社会现象，便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社会语言学就称之为变异。但凡活的东西，随着时间地点和环境的不同，都会发生变化。语言也不例外。假使一种语言从不变化，那么，它就不能适应社会交际的需要，成为一种僵死的、没有表达能力的，因而没有交际功能的语言，也就是没有用的语言。在语言变异中，变得最快的不是语音，不是语法，而是语汇——或叫词汇。词汇（有时我称它为语词）是语言中最敏感的成分，是变得最快，最多的组成部分。

这次我到香港来，住了几个月，有机会接触和研究香港人说的、写的广州话，觉得很有趣。我认为香港是研究社会语言学最好的地方——因为香港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所以香港人讲的广州话产生了一种很复杂的现象——我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之为“语言马赛克(mosaic)现象”^⑥。香港社会生活节奏快，而且夹杂着使用中文和英文，不仅是单纯的中文或单纯的英文，而是中文夹杂英文的一种变异了的广州话，香港报上发表的文章（有时甚至电讯）用的是广州话，即夹杂了广州话语汇和语法的语文，这是其他地方很少见的。香港人的母语，是一种方言，甚至是一种次方言（即香港化的粤语）。在如此奇特以及具有丰富语言材料的环境

中，研究语言变异实在是太好了。我主要从电视、报章和日常交谈中来研究，还没有做到理论化。比方说，香港人说中国的国，发音同“各”一样，[gw]变异为[g]——我记录了电视中讲中国三十六次，只有三次念[gw]，三十三次都念[g]，即是说“中国”同“中各”的发音一样，四十二年前我住在香港时却不是这样的，那时只有很少人把“中国”念成“中各”。有人说，广州现在也同香港一样，[gw]转化为[g]，我没有研究过，如果是这样，则广州香港的广州话有些语音同时或先后朝着同一个方向变异了，这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我发现香港人称“朋友”为“频友”，那就是[ŋ]转化为[n]了——这个现象也很有趣，因为英国有一位社会语言学家也发现伦敦以外某些地方人们也把[ŋ]变异为[n]——比方 singing 念作 singin, fishing 念作 fishin, 总之，[ŋ]变为[n]。

话又说回来。语言中变化得最快最多的却是语汇(语词)，尤其是流行语，俚语(slang)，在学生中的流行语来得快，消失得也快。现今最有感应力的传播媒介是电视——电视传播的流行语或俚语，一下子就在社会生活中广泛使用了，这真可惊，有时也很可怕。我在意大利考察过民族统一语如何能在短短的十五年间成为社会交际的唯一用语，主要是电视的功劳，其次是小学(小学里所有语言行为都必须用统一的民族语)。所以电视能起积极的规范化作用，也能起消极的冲击规范的作用。

在香港这样的复杂而多变的语言环境里，社会流行语以及俚语之类的语词，变得最快。来得快，消失也快。我这次一到香港，就遇上电视台播放连续剧《香港蛙人》，——这“蛙人”不是字典释义所说的潜水人，而有一种特殊的含义——在座都是香港人，这个语词的语义用不着我解说，不过它着实困扰了我好些日子，直到后来向中文大学张双庆先生请教，才明白这个语词的确切语义。我相信，这个语词不久就会消亡的，因为移民热潮过后，“蛙人”就不再存在——既然社会上没有了这种“蛙人”，“蛙人”一词就不会再

上口语了。我知道前些日子香港流行过另一个语词，那就是“茶煲”——茶煲就是英文trouble的音译。我有茶煲了，即是说，我有麻烦了，我有困难了。香港人真聪明，竟可以把trouble译成“茶煲”！这样的外来词（借词）真是世界少有！

社会流行语（特别是在学生界流行的俚语）自我淘汰得快，这在无论哪一种语言都是一样的。有一段时间，北方话把“好”，“极好”说成“棒！”，“棒极了！”甚么是“棒”呢？不知道。总之，就是好的意思。另外一段时期，“帅”字流行了，很“帅”，那就是“好”，“很好”。前一阵人们却爱说“盖”。北京前门箭楼附近曾经竖立过一个广告牌，是飞利浦公司的，上面只有一句话：

音响效果盖了 飞利浦

怎么音响效果会有一个盖子呢？北京人一看就明白，这“盖”就是好极了的意思，但用了这么一个字——盖了这么一盖，语言效果就完全不一样：生动地给人一种十分好的感觉。香港广州话也有很多这一类的流行语，通常都是自生自灭的，只有极少数能活下来，进入社会通用语词库而流传下去。

1.3 语言变异

语言变异对于语文教学来说，是一种颇为困扰人的东西。在香港，那就更使人烦恼。现在大家都提倡“母语教学”，可是对于语文教学，“母语”问题也还有麻烦，因为香港人的母语是港式粤语——就是我上面提到的次方言——，可是作文却要写白话文。我看见香港报纸有不少专栏写的不是白话文，却是用方块字写成的广州话，或者是夹杂着白话文的广州话书面语。可是在中学小学的语言教学上恐怕并没有人提倡写这种“马赛克”文字。社会上用

的文字，除了某些广告之外，怕也没有人提倡用这种文体写作。所以我说，语文教学在这里遇上了成倍的困难。学生要把他想要表达的语言，由港式广州话“翻译”成普通话^①——即北方方言区人们所讲的“母语”——，然后用方块字把它写出来。因为白话文（语体文）是书面化的普通话，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语音，以北方话区方言为基础语言的一种叫做“全国通用”的语言。前几天有一位朋友跟我说，香港人从前学写的书面语是文言文，现在则是白话文，他说学写文言文和学写白话文一样困难。我同意他这么说。因为写文言文先要把母语（港式广州话）“翻译”成古人说的话（而且多半是古人的书面语），同写白话文先把“母语”翻译成北方人说的话，遇到同样困难——自然，我说的“翻译”是在大脑里无声地进行的，既不要译员（“通译”），也不要近来上市的种种翻译机，多了一个“翻译”过程，无论对教者还是学者，都是一桩苦事。提倡学普通话也许会减少这个“翻译”过程的难度，但那将是一件长期的工作，不能希望立竿见影的。所以我说，在此地进行语文教学，会遇到语言变异所引起的困难。可见从事这项工作的同事们是多么值得尊敬！

我到过欧美好多个常常发生纷争的双语区或多语区，例如加拿大，比利时，荷兰，瑞士，使用语言的界限是很清楚的，有的大城市路牌也规定必须用两种语言并列（在双语区），但口语里却没有把两种语言的词组混在一起。比方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市，是法语区的“首府”，讲的是道地的法文，决不会夹杂着英文使用。可是在香港，英文和中文几乎溶成一体，讲中国话（当然是香港粤语）时夹杂不少英文语词，讲英文时偶尔也夹点中国语词，真是“落霞与孤鹜齐飞，中文共英文一色”。这次我来香港住得长些，常常搭地下火车，报站名的一连串语词曾经使我大惊失色。我知道我自己笨，听人报站名时往往要提心吊胆仔细捉摸才清楚报的是甚么。报站名的语调是平平的，没有抑扬顿挫，声音略带疲倦的调调，这是